

16089.1

H51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后革命氛围与 全球资本主义

——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胡大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
马克思”研究 胡大平著。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2.5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 蒋树声主编)

ISBN 7-305-03912-8

I. 后... II. 胡...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②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动态—世界—参考资料
IV. ①F03②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102 号

丛书名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书 名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著 者 胡大平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箱 nupressl@publicl.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65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2000

书 号 ISBN 7-305-03912-8 C·116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任 蒋树声

副主任 洪银兴 陈 骏 张异宾(常务)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子铭	孙义燧	吕 建
任天石	刘荣川	许敖敖
陈 骏	宋林飞	张异宾
吴培亨	柳士镇	姚天扬
洪银兴	钱乘旦	龚昌德
童 星	蒋树声	程崇庆
谭仁祥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

总序

洪银兴

21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从根本上说，21世纪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博士是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如何培养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使他们在下世纪成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无论是对高校本身还是对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风采，加强学科与学术队伍的建设，促进新生学术力量的成长，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我校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此次编进《博士文丛》中的论著，大多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我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的博士论文，是在广泛动员、严格把关的基础上，根据质量第一、公平公开、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规范运作的原则认真遴选出来的,同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特别注重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南大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博士文丛》虽然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基本上反映了南大青年学者丰富而活跃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南大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此次我校组织编辑出版《博士文丛》,就是从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并着眼于下世纪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相信《博士文丛》的出版对于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动学科建设,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卓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这一人才摇篮里茁壮成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这块科学沃土上勤奋耕耘。近百年的办学实践塑造了南大师生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博采众长、汇融百家的开放精神和兢兢业业、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培育了南京大学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世事沧桑,但这样的精神和学风一直在南京大学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正是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学风,使南京大学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中,不断从本民族和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吸取新的营养,形成了南大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氛围,使南大在近百年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永不衰竭的青春活力,使学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南京大学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强大、科研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大师,一流的学术大师又离不开一流的学术环境。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南京大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

学将一如既往,继续改善条件,为广大教师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同时我也衷心希望全校教师尤其是广大中青年教师,发扬我校优良传统与学风,在南大优良的学术环境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5月20日

序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景观。从青年卢卡奇开始,经历布洛赫、列弗斐尔、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萨特之类的“人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阿尔都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向冲击,在 20 世纪的曲折演进中,它以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的左派理论注入了宝贵的资源。就这种思潮的核心特征来说,它面临着双重任务:重解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越往世纪尽头,后一个理论旨趣就越处于高位。我们说,作为一种“第三条道路”的生存样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的逻辑发展与资本主义现实变化以及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潮的流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客观上,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多元化(欧洲民主政治的危机、作为反抗政治的学生运动的流产以及女性主义政治、生态政治和第三世界政治的崛起)、文化矛盾(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引发的价值冲突)等等时代背景影响下,左派政治和理论也面临着战略重组的处境,加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悖反的表面化——这种悖反本身也是现代西方理性分裂之悲喜剧的无意识表征,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和阿尔都塞的“理论上反人本主义”双重作用下便衰落了。

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演进,我曾经区分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种不同的态势，这些态势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分裂和多元的特征，它们与其他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潮较之从前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也对整个西方学术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逻辑的全面布展，我国学术也越来越与这些思潮产生更为密切的“共谋”关系。但是，在引进或移植某一种西方学术话语的过程中，由于起步较晚、文献缺乏以及自身准备不足等原因，我们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领域时一直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深度解读和全新范式的建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一直呼吁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定位、对个案的文本学解读和研究范式的探索。

胡大平的这本《后革命氛围和全球资本主义》，是在他的博士论文《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解放议程的新探索》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的。该书试图通过美国左派历史学家德里克这个个案来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总体特征和走向。作为导师，我参与了他的选题，也见证了他艰辛的研究过程，也一直在期待这本书的问世。因为它会是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部分量较重的论著。我愿意郑重推荐给这一领域的学者们。

在总体上，我认为这本专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德里克研究的论著。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晚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前沿问题，对它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全新范式的积极探索，但是，自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杰姆逊使用“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相反，大多数理论家们喜欢把它混杂在后现代思潮之中（如凯尔纳和贝斯特等人）。事实上，晚期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理论逻辑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则和根本观点，它强调“主义”的哲学框架是后工业社会无法超越的，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一种激进思潮，它却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为前提的，后马克思思潮则

更是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为基础的。与这种错误倾向不同,德里克的“弹性生产”时代资本主义之论见是最富创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代表之一,其对资本主义“全球抽象”性质的分析极为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全球化的性质,而他对全球劳动分工和新型压迫关系的指认也十分有力,特别是他对后殖民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更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应该说,胡大平的这一研究具有相当敏锐的专业眼光和前瞻性的视角,在选题和研究方法方面的新颖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第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中,该书非常明显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同时也恰当地捕获了研究对象的特征。无论是对德里克理论的历史定位,还是对他逻辑构架的判断,都比较精当。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里克的理论资源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简要的历史分析,这本专著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个点上提炼了激进理论资源的一些基本特征,恰当地解释了德里克本人“后革命氛围”的实质含义,并把他置于“后 68 年代的激进传统”中,围绕“历史性”解释的争论来分析他的方法论特征,这种研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左派历史学家,德里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便因中国现代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生成广泛的国际影响却是 80 年代以来的后殖民批评和文化研究。如何沟通这两个阶段?这对于人物研究是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本专著从激进理论的主题和方法论逻辑两个方面把德里克作为一个有着阶段性分期但又内在统一的理论家,这种处理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是具有说服力的,因此,在完成对德里克 80 年代以来的理论分析任务后,反过来专门讨论中国专题时,本书逻辑合理,意义语境也很明晰。这便充分地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第三,这本专著虽然论题明确集中,但是其涉及问题却十分广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泛。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逻辑的理解到具体的革命实践甚至“后革命”理论变迁，从全球化性质分析到后殖民思潮的理论梳理，从对晚期资本主义思潮不同代表人物的把握到对作为“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案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些问题既包含着大量的历史问题，也都是前沿的难题。客观上，要游刃有余地驾驭这些问题十分困难。该书在总体上表现不俗，在基本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立场鲜明，分析和判定合理。

第四，最后有必要一提的是，该书的规范和作者学风问题。作为一名在职博士生，胡大平一直承担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科建设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和自己的教学工作，但是，他从没有放松自己的科研。在论文完成过程中，他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独立地提出问题，并没有简单地采用流行的解释，因此，这本专著不仅提出不少新颖的见解，而且在形式和研究方法上十分规范。

当然，晚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域，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当代全球化思潮以及资本主义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在有关问题上深入展开，我希望胡大平能够把这个问题继续做下去，在中国语境上展开对全球资本主义研究，并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这个背景下的生长问题。

路很难，但走实了总会向前的。我有理由期冀更好的未来。

张一兵

2002年4月10日于南京大学

目 次

《南京大学博士文丛》总序(洪银兴)

序(张一兵)

导 论

第一节	德里克其人：学术和政治	3
第二节	新激进主义：“后 68”传统	6
第三节	全球化：新时代的政治课题.....	11
第四节	后革命激进政见：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解放 议程	16
第五节	关于本文	21

第一章 革命、社会想像和历史

第一节	革命：历史想像力.....	29
第二节	延宕：20 世纪革命理论的变迁	46
第三节	接合：历史和现在.....	63

第二章 弹性生产与全球资本主义

第一节	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对全球关系的重组	71
第二节	弹性生产与全球资本主义	93
第三节	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与新的话语实践.....	116

第三章 后革命氛围与文化批评实践

目 次

第一节	后殖民：意识形态与知识	125
第二节	后革命氛围：革命和反革命	146
第三节	知识分子：解放和权力	162
第四章	解放议程和地域政治学	
第一节	从革命到解放议程.....	183
第二节	乌托邦时刻：作为整体性理论抱负的文化 革命.....	198
第三节	地域政治学：边界之地的激进主义	215
第五章	“晚期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	
第一节	历史主义结构分析法构型.....	235
第二节	“晚期马克思主义”丛林：作为抵抗的文化政 治学.....	260
第三节	超越时代的“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的辩证法.....	280
第六章	“后社会主义”：后革命氛围中的中国	
第一节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革命：反殖民与现代化	306
第二节	“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313
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 主义”案例	317
第四节	一个简短的评论.....	320
参考文献		328
后 记		337

导 论

一个被标注为“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时代，甚至学者们言必称“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社会经历着激烈而复杂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如何穿透物质环境坚硬的外壳，使隐藏其中的可能性凸现出来，已经成为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环境的暧昧性塑造了激进理论的暧昧性；曾经唤醒了 20 世纪革命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不再被知识分子读成一种面向解放的实践，作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一下子变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预言者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论证者。^① 虽然有学者反复强调，马克思仍然构成我们今天激进地思考未来

① 在一片意识形态狼藉图中，如贝克所描述的那样：马克思如今不再是自由作家和批判的批判家，而是成了世界银行的雇员、全球化了的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掮客或经济记者，用不同的笔名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或《明镜》上发表文章；《资本论》第四卷将作为看不到结尾的系列丛书以世界各种语言出版：“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由盛而衰的东南亚”、“我们将变得富裕、越来越富裕”……在东西方冲突时期，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德国被纳入宪法保卫机关的管辖范围，并受到职业禁令的威胁的东西，今天在全世界各主要报刊中都可以看到——无任何不良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失败与胜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 150 年以后——变得难以分辨。甚至可以说，失败被当作胜利：马克思已变得多余，因为尽人皆知，他已失去马克思的本来意义。全球化也成了没有马克思的资本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 页）如果这说得还不够通俗的话，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共产党宣言》成为华尔街金融家抢手读物”这样的报道出来以后，在马克思成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专家正面引用的作者之后，马克思也就被人们解读为“布尔乔亚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也就与作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关系。在中国，我们也能从大量的有关“新经济”的通俗读物中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例子。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的绝对视域，但是由于马克思可以“缺席”或“不在场”，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个体知识分子生存体验的一种公开表达。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和社会主义逐渐被某些“新激进主义”分子视为异己的甚至从来都不曾在历史上“在场”过的东西。例如，“第三条道路”激进政治精神领袖和理论中坚吉登斯宣称，那个搅扰了欧洲资产阶级美梦的共产主义“幽灵”，虽然在过去 70 年中获得了坚实的存在，但是如今已经被送回了它的地下世界，激进主义者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可以实现的“真正自由”的社会的期望似乎已经落空。^①

如果说吉登斯的“告别革命”表达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情绪，它是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不过，作为一种历史的宣告，隐藏在其中的某种私下利益却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全球化并没有终结历史，自由主义许诺给世界的“自由与繁荣”也远远没有到来，相反，以“第三道路”重新纠合起来的“北约”虽然把自己打扮成黑格尔意义上的那个“普遍国家”或者“绝对理性”，但它却很吝啬，把鲜花只留给自己，而扔给别人的则是炸弹。正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新的矛盾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期待，在这种期待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重新发明革命”的口号在西方左派或激进主义阵营中也并不鲜见。换句话来说，作为激进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进入休眠状态甚至被送回到它由以诞生的地下，应该说它仍然在听从着时代的召唤。本文评论的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新激进政见”，作为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左派反应，它强调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新形式的控制或支配问题（即霸权问题），在解放政治意义上主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替代。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德里克以其独特的对时代的体验和灵活的政治视角有说服力地强调了在当代复杂的历史环境

^① [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中任何对于时代的激进思考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整体解放诉求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借鉴。

第一节 德里克其人:学术和政治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年~),著名的汉学家,左派学者,现任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出生于土耳其,曾立志于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以工程专业完成大学学习,后赴美研究科学。但是,到达美国后,他很快就抛弃科学研究而全身心转向历史,选择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专攻领域,在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完成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专题的博士论文,并于1978年发表《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 – 1937*)。在相当长时间内,他对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激进运动中的社会革命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公开出版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深入田野和工厂的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和上海国家劳动大学(1927—1932)》(合作出版,*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Anarchists, the Guomindang, 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 1927 – 1932*)等大量论著,20世纪80年代,他在这一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对于中国,他情有独钟。近年来,他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而且同他人合作编辑了不少有影响的论著,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后现代主义与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等。20世纪90年代,他以独特的历史视角介入文化研究,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在“全球化与地域”这个专题中发表了大量的激进论见。这些著作包括他独立撰写的《革命之后：警觉全球资本主义》(*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以及与他人合作编撰的《作为文化产物空间的亚洲/太平洋》(*Asia/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边界之上是什么：关于太平洋地区思想的批评视角》(*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后现代性的历史》(*Postmodernity's History*)、《三个世界之后的历史》(*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地方和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学》(*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等，凭借这些著作，他在国际学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其学术路径看，德里克大致经历二个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一个被广泛引述的历史学家，其主攻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90 年代以来，特别是以《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首发于《批评探索》第 20 卷第 2 期，1994 年冬季号)为重要代表作跻身于第三世界(文学)批评，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锋，其关于“全球化”、“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的论见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兴趣，他也因此被一些学者视为“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代表人物，^① 他的有关论著也被列为许多大学文学系的参考文献。

① 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都是含义并不确定的术语，它们包含了诸多立场相左、风格迥异的理论家。就德里克而言，“后殖民主义”是其理论的批评对象，他本人就使用“后殖民论”(post-colonial argument)来界划自己的讨论对象。(参阅，“后殖民还是后革命？后殖民批评中的历史问题”，载《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在《后殖民理论》中，巴特·穆尔一吉尔伯特区分了“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和“后殖民批评”，在他区分的意义上，德里克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而不是“后殖民理论”家。(参阅，《后殖民理论》，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从其政治立场看，德里克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说来，他也算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①诚然，我们可以从德里克大量的激进论见中直接感觉到这一点。或许因为这一点，以“新型的未来可能性想像”为基调的“革命”，不仅是其理论研究的核心对象之一，而且也是其所持的左翼激进主义立场。不过，仅仅这样论断也是不够的。因为在 20 世纪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左翼知识分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并非是确定的。例如，肇始于 20 年代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狭义的政治思潮在 60 年代末就终结了，而由 1968 年“五月风暴”直接催生的“新左派”显然不仅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大的距离。^②随着“人道主义”这个资产阶级梦想的破灭，在左派那里，“主体”也开始死亡，福柯式的史学操作终结了过去的时代，后结构主义理论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关于“差异”和“少数族群”的权利也随着对资本主义宏大叙事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而成为左派的话语。90 年代更甚，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操作，地方性知识与革命的关系也在新的层面上展开，呈现与先前历史不同的整合特征。

德里克的理论研究无疑受到上述左派运动的主题变换和形式转移的影响，这正是其“后革命激进政见”得以出台的思想史背景。正是从这个背景出发，我们将看到，他的“后革命”观不仅是对全球化话语中的“反革命”思潮的一种戏讽，而且实际包含

^① 参阅王宁为德里克中文文集《后革命氛围》所作的编者前言，[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② 当然，这里的“新左派”也是广义而言的。就其狭义说，它是在 50 年代形成的一个术语。在苏共 20 大以后，在大量左派知识分子右转背景下，这一术语指那些不同于传统但仍然坚持左派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广义上，它与“新社会运动”具有重叠性。